

社會科學研究的主體與目的：知識論的反思¹

石之瑜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內容摘要：社會科學的研究的目的，有人說是建立法則或定律，有人說是解釋，有人說是要去預測並且控制。一旦了解研究者不是獨立於研究活動之外，而是在與研究對象互動中了解自己的生活的，那應該接受，詮釋的境界是社會科學更進一步的境界。研究者介入或推動一個研究過程的時候，無所不在地受到了自己的生活關切、生命歷史與生長經驗所影響，但是流行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要研究者忘記這一點。相對地，以詮釋為重點的知識論，則預設了研究者對自己社會位置的體認，所以研究者才能懂得尊重研究對象的社會位置。在解釋的知識論中，研究者追求的是關於研究對象行為因果的真理，也就是上帝的道理；在詮釋的知識論理，研究者最終在探討自己的生命關懷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

關鍵詞：知識論・方法論・解釋・詮釋・主體・社會科學

壹、客觀方法導向的知識論

社會科學研究至今已經有百年以上的歷史，而人們現在所熟悉的社會科學，是在 50 年代、60 年代承續早年的行為科學發展而來。²自二十世紀初期起，行為科學

¹ 本文係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朱雲漢教授開設社會科學方法論課程特約講演修改完成。

² 最早溯自十九世紀中葉，社會科學的研究便開始仿效自科學之方法，嚴格劃分價值與事實，認為社會理論如果期望成為科學知識，必須以觀察實驗之方法作成可以檢驗之命題。社會科學只能做事實的陳述，不應滲入價值判斷。韓培爾，《社會科學方法論》，（台北：風雲論壇，民 87），頁 7。

就開始對過去傳統的研究進行改造³，在 1930 年代芝加哥大學的 Harold Lasswell 等人為首的芝加哥學派，揚棄了所謂「描述的」研究，著手實證探究，採用調查與訪談、參與觀察等蒐集資料的技術，並且盡力達到主觀價值判斷與事實陳述的嚴格分離，二次戰後人們對自然科學價值的普遍接受使這種以自然科學為模範的社會研究，吸引許多學者加入研究。⁴

今天的大學裡要開授社會科學方法論這樣一堂課，通常授課者希望把社會科學研究最進步的知識論、方法論方面的問題，介紹給新進的研究者。⁵但目前的講授缺乏一個對當代社會科學研究的反省，其中頗為關鍵的一點是，在一般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教科書中，比較少去討論研究者如何選擇研究的題材，⁶或是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自己，在研究活動中如何理解週遭生活世界對於研究所產生的影響。通常在社會科學研究的設想中，研究者本身的主觀意識、主觀情感和主觀態度必須要排除在研究過程外，⁷有時如果排除不了，只是技術問題或個人問題，而不會從概念上反省所謂的客觀研究的意義。

什麼樣的研究是科學的呢？一般同學在接觸社會科學的第一堂課時，應該都會有所了解，即社會科學之所以能被稱作是科學，是因為在做一項研究時，不同的研究者之間分享有一個共通的過程和方法，不論是任何人來做，都會得出同樣的答案，

³ 研究者對事物的主觀判斷是了解事物所必要的，因此不僅事實與價值判斷不易加以區分，甚至不應加以區分，有些學者甚至不承認客觀現象的存在，在他們看來，純粹的客觀僅為一抽象的假設而已，我們最多只能達到若干人的居間的主觀性，而不能達到客觀性。呂亞力，《政治學》，台北：三民書局，民 84），頁 4-5。行為科學極力強調政治學應以人與行為為其研究焦點，行為科學，或稱行為主義者主張實徵研究的方法，真正成為有如自然科學般的「科學」。任德厚，《政治學》，（台北：三民書局，1997），頁 35。

⁴ 呂亞力，頁 22-25。

⁵ 社會科學之所以為一門科學，從行為主義者的觀點有三：第一、政治學是一經驗的政治學，或至少是以尋求經驗性知識為主要職責的政治學。第二、政治學就像自然科學一般，是經過資料的累積與分析，與由下而上通則的建立的學科。第三、政治學家扮演的是一個「科學家」的角色。主要是在尋求「純粹」的政治知識。任德厚，頁 36。

⁶ 例見，張家麟（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思維》，Kenneth Hoover and Todd Donovan（著）（台北：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民 89）。

⁷ 社會科學所要求研究者的是，探究者必須明確地公開說明研究過程的方法，以及導致結論所採用的全部資料。李明燦，《社會科學方法論》，（台北：黎明文化，民 67），頁 6-7。

這樣的研究就可以視為是具備了客觀性，或有謂之為共通主觀性，⁸是指研究內容及其結果，不會因為研究者本身主觀的意識而受影響。⁹為了要達到這個所謂客觀性的要求，社會科學家必須採納同一套方法，透過這一套方法讓個人喜好得以過濾排除，¹⁰如此一來，一位社會科學研究者就如同一條生產線上的裝配工，如果選擇的研究課題相同，則研究結果頂多只會在技術純熟程度上有所差別。故社會科學之所以為科學的重要指標，就在於有一個不會受到個人因素影響的研究方法或程序。

貳、無所謂客觀的研究選題與設計

也因此，台灣的或是非基督教地區的社會科學研究，其研究課題如何選擇，往往社會科學方法論不會告訴我們，甚至認為要選什麼樣的題目，其實是沒有關係的，因為只要方法客觀就好。於是社會科學研究之所以是社會科學，乃是因為能以方法為主導，而並不是因為是以社會有關課題作為主導。像研究台灣民主化的問題，今天社會科學界對此非常有興趣，但到底是研究者一生下來，就自然而然對民主化的問題感到興趣呢？還是因為學校殿堂裡所教的，都是有關於民主化的議題，使得後起的研究者在選擇時，最容易想到關於這方面的議題。

過去曾經有過一個關於襪子的類比，值得轉述作為討論的引子。假如研究江澤民如何決策，通常研究者先假定一些會影響到他決策的因素。社會科學方法論不會規定研究者如何假定，只堅持任何研究者的假定，都要透過公認的研究程序來檢證，

⁸ 「客觀」類似於「價值中立」。「價值中立」是 Max Weber 所刻意提出的，實證論者奉為圭臬，就像是科學家的「職業倫理」。王振寰、翟海源（合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出版社，民 88），頁 47；科學的客觀性並非來自某位科學家企圖客觀，而是來自許多科學家的協力合作，可被描述為科學方法的互為主觀性。莊文瑞（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Karl Popper（著）（台北：桂冠出版社，民 79），頁 968。

⁹ 「研究論文最重要的條件就是客觀」，宋楚瑜，《如何寫學術論文》，（台北：三民出版社，民 67）；「運用科學的方法最大的忌諱是情緒化」，呂亞力等，《論文寫作研究》，（台北：三民出版社，民 81）。

¹⁰ 社會科學唯一能走的路徑，是要忘掉一切有關語文上的爭辯，用所有社會科學根本上都同樣的理論方法作為臂助，踏實地來解決我們這個時代實際的問題。莊文瑞，頁 968。

¹¹如果檢證是對的話，假設就能夠取得近似於法則的威力，也就表示可以解釋其他人的決策行為。

如果研究者假設，江澤民的決策行為會受到他所穿的襪子影響，於是觀察他穿白色的襪子和穿黑色的襪子時，會使他的決策如何有所不同，因而希望從這個研究中，建立襪子與決策之間的統計相關性，即是不是在穿白襪子的時候的決策會是一種，穿黑襪子的時候的決策又是另外一種。如果研究花了 10 年，實在是得不出結果，研究者可能認為原本的假設有問題，就換一個假設，承認決策不是受到顏色的影響，而是受到了長短的影響。恍恍惚惚再過了 10 年，可能發覺好像跟長短也沒有什麼關係，後來便想到，可能是與襪子的質料有關。結果又過了 10 年，當然還是沒有成就。

研究者可能必須想了又想才會恍然大悟，因為研究者也許自己喜歡運動，所以每想到某天可以運動，心情就很高興，做起事來就是一套模式；若不能運動，而且還要開會，心情就很不好，穿的也不是球襪，做起事來就相當的沉悶。研究者於是沒體認到，因為自己對球襪很敏感，而且既然人的行為是普遍性的，所以理所當然認為江澤民也是一樣。¹²等到發現這個研究假設從頭到尾都是錯誤的以後才體會到，原來是研究者本身的好惡影響到了研究假設。¹³

當美歐學者在研究拉丁美洲民主轉型與威權體制時，或研究台灣政治體制的民主轉型與鞏固時，可以類比為研究江澤民的襪子。到底是誰教給當代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在研究台灣的體制時要訂下民主鞏固這樣一個題目？能不能承認作為一個研究主體，其生活關切、生命歷史與生長經驗，再再地影響到了自己研究的進行？然而講求客觀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一定不是這樣告訴讀者的，它通常會主張，作為一個

¹¹ 使經驗具有公共性，故與私人的美學或宗教經驗相反，即某人所遭遇到的問題，人們都能重覆體驗到，則該經驗具有公共性，科學家試圖以一種能夠付諸公共檢驗的型式，來表達他們的理論，莊文瑞，頁 963。

¹² 在文化科學中的研究工作，只能獲得主觀的結果，某個人看來是有效的，在別人看來是無效的。黃振華，張與健（譯）《社會科學方法論》，Max Weber（著）（台北：時報出版社，民 80），頁 97。

¹³ 科學理論之任何觀察研究或實驗都受理論「污染」經驗觀察沒有純粹中立、獨立、客觀的，都具有理論依賴性(theory-dependence or theory-laden)。新理論不但體現不同的世界圖景，且這種體現通常都透過「新理論創造新穎經驗」而產生，也因此，經驗主義的化約說明或證成理論，都不足以說明科學認知的特性。周昌忠（譯），《反對方法》，Paul Feyerabend（著）（台北：時報出版社，民 81）。

研究者，不能將主觀的情感放到研究當中，研究者和研究對象之間必須要維持一段距離，太靠近會造成研究者受到研究對象的主觀情感所感染，則研究出的內容就失去普遍意義了。

上述研究江澤民的襪子算不算是很客觀的呢？假如幾代的研究團隊花了 30 年，浪費了龐大的研究經費，蒐集了儘多的無用情報，只是證明決策與襪子無關，這到底是則麼回事呢？乃是沒有認知到，研究團隊浸淫在以運動為主要休閒的生活經驗中，這個共通背景主導了其研究取向，甚至決定了其研究題目。人們往往有一個強烈的傾向，當他們不知道別人的情況時（如個性、愛好、思想等），就常常認為別人具有他們自己的特性。或者說，當人們需要判斷別人時，就往往將自己的特性「投射」給別人，想像其他人的特性也和自己一樣。¹⁴

參、來自歐美的問題意識

所以在閱讀一項研究成果時，首先要問的是，這個研究議程中的問題是怎麼來的？¹⁵同理，研究者進行一研究之前也必須自省，是誰教自己發展出當下的研究議程的？有一次在美國政治科學研討會上，碰到一位鑽研人權的教授，Jack Donnelly，他同時也是推動人權理念不遺餘力的一位知名人士，當場所討論的正是亞洲和拉丁美洲民主化的問題。會上有一個玩笑，提到美國的會計師，會計師的執照在美國可是金母雞，但如果有一位研究者主張，會計師的稽核行為，受他們當天的領帶顏色是紅色或藍色的制約，會影響到稽核的嚴謹度，任何人可能都會對這個研究嗤之以鼻，認為顏色和稽核行為有關係的假設是玩世不恭的。不過作為一位人權學者，Donnelly 怎麼去判斷，拉丁美洲擺盪在所謂民主與威權之間，對於拉丁美洲的社會而言，不是像領帶的顏色對會計師的影響一樣無稽？如果民主有助於發展經濟，人民就支持民主，如果軍人的威權政府有助於發展經濟，人民就支持軍人干政。¹⁶

¹⁴ 游伯龍，《行為與決策——知己知彼的基礎與運用》（台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民 74），頁 107-108。

¹⁵ 社會科學家自己的價值系統對其研究題目的選擇有莫大的影響。而且仍難免受每一社會共同信仰與價值觀的誘導而決定其研究題目的優先層次。李明燦，頁 42, 44。

¹⁶ 在巴西，當總統和國會發生爭執時，人民可提案到軍隊，要求軍隊執行憲法上的義務，保衛國會的至高權力。

也許研究者今天看到拉丁美洲的民主力量起來推翻了軍人政權，再以選舉產生了領導人，就認為拉丁美洲民主化。但過了幾年，軍人政府再度出現，因為民主化反而將經濟搞垮，所以中產階級又接受軍方鎮壓勞工運動，讓國際大企業能夠在社會恢復秩序的情況下，再次將資本投進來。¹⁷所以，先前將軍人政府推翻的這一段過程，很難逕以民主化稱之，蓋民主化的概念預設了一個社會政治體制發展的線性目標。結果當軍人政權再度出現時，研究者才驚覺到原來先前的民選政府進程並不代表民主化。

世界著名的政治學大師杭庭頓在 1984 年就問了一個問題，是不是還有國家會變成民主呢？¹⁸因為當時他看到了拉丁美洲的政變浪潮，對民主前途感到非常憂心，認為世界上不會再有民主國家出現了。不過到了 80 年代的末期，他看到拉丁美洲再度出現民選政府，則樂觀地認為第三波民主浪潮又來了，何況之後東歐又出現民選政府。¹⁹但到了 1993 年他又寫了關於文明衝突的書，表示還有一大批伊斯蘭與儒教國家抗拒西方文明甚力，²⁰既然他們抗拒自己轉變成基督教民主國家，故慨嘆大規模的文明衝突終究不可避免。²¹這位有名的政治學大師在研究民主時的反反覆覆，²²能不能脫離他自己的意識形態以及根據這個意識形態所形塑的世界呢？

舉一個東歐國家的例子——愛沙尼亞。在脫離蘇聯的決定上，愛國進行了公民投票，照說是一種所謂的民主化。不過在獨立後，愛國繼續舉辦另一次公民投票，試圖排除不會說愛沙尼亞話的人取得公民權，實則就是針對居住在愛沙尼亞境內的俄羅斯人，這個排除性的目的顯然與民主的概念背道而馳。但這一類的投票活動，有助於使愛國的民眾融入民族主義，宣揚民族的尊嚴。而在研究民主的人眼中，民

¹⁷ 劉軍寧（譯），《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Samuel R Huntington（著）（台北：五南出版社，民 83），頁 46。

¹⁸ Samuel Huntington, "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tic?"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9, 2 (1984): 193-218.

¹⁹ Samuel Huntington, "How Countries Democratiz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6, 4 (1991): 679-616.

²⁰ 劉軍寧，頁 326-334。

²¹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 (1993): 22-49.

²² Huntington 氣得稱這種反覆現象為 authoritarian nostalgia，劉軍寧，頁 278-279；他沒有想到自己研究目標的選擇和調查研究的因果關係，其程度和深度都是取決於主宰著調查研究者及其時代的論述。黃振華，張與健，頁 97。

族主義是有害於民主的。此刻，民主化變成一個工具，用來推動民族主義，則民主化程度反反覆覆也就不足為奇。如同在台灣，被喻為亞洲民主先生的李登輝總統就很具體地表示，他在台灣推動民主化的目的，是要建立只屬於台灣的本土認同。²³如此一來，民主化的目的不是西方自由主義社會所熟悉並鼓吹的民主，因為假如民主化無助於民族認同的建立時，就必須限制，故而民主社會所推崇的個人自由，往往與民主化現象背後的民族主義動機相抵觸。

肆、社會科學作為政治主張

一般社會科學家或許會辯稱，受短期經濟現象或民族情緒主導的民主化，只是不成熟的民主化，只要研究者事先建立一套全面的指標，依然可以界定任何一個民主化進程下的社會，到底實踐到了什麼程度，是否穩固，有無迴轉危機。如果發現其中受到民族主義的干擾，則可逕行歸之為民主化的條件尚未成熟的類型。但這樣的歸類方式是不是真的就達到客觀中立呢？愛沙尼亞或台灣的民族主義論者可以質疑，為什麼要問我們的民主化條件是否成熟？為什麼不問一個新國家要宣揚民族主義時，要用什麼手段比較有效？或在前一個例子中，研究者要問拉丁美洲國家民主化的可能性，為什麼不問拉丁美洲某個特定的國家要發展經濟來解決當前的經濟危機時，到底是民選政府或軍人政權比較有效？²⁴關心民主化的研究者本末倒置，反而把當地政治參與者的工具當成目標來研究，這顯然會影響到研究者對研究對象所下的判斷，使這個判斷像是關於江澤民的襪子或會計師的領帶顏色一樣不相干。

假如每個社會科學的研究者，都是在歐美接受方法學的訓練，回到母國後，自然仍然有需要與留學所在地的社會科學學界保持聯繫。本土的研究者萬一因為融入本土的行為動機，而設計歐美學者難以體會其意義的研究議程，則因為歐美的學者拒絕加入對話，使得某一項本土導向的研究，會看起來像是在抗拒民主化，造成歐美學者的疏離與批評。於是各地的學者為了進入主流的學術圈，都必須採用歐美學

²³ 見《亞洲的智略》，台北：遠流，2000。

²⁴ 例如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就認為，民主制度被強加在亞洲國家上，以致李光耀等亞洲國家的領袖被迫不斷修訂這制度，努力設法使它發揮作用。他相信最終之重點不在制度形式，而在於它是否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張定綺（譯），《李光耀治國之鑰》，韓福光，華仁（Warren Fernandez），陳澄子（合著），台北：天下文化，1999，頁153。

者關心的問題為問題，將這些問題帶到拉丁美洲、東歐或台灣來研究。在地的學生跟著做這一類研究，使學生之中也興起與歐美學術界對話的渴求，最早接觸歐美社會科學術語的學生因而顯得先進，有機會參與更進階的留學。²⁵久而久之，歐美學者關心的問題成為世界各地共通的問題，很少有研究者會回頭再去檢討，自己研究課題的源頭在哪裡，從而忘記自己對於研究議程上的設問，是透過學習而來的，不是客觀存在於學術之外的。

現在中學地理課程中會講到格林威治時間，並提到國際換日線，當今這個時間計算的方式普世通用，似乎不存在主觀性。但如果不追溯大英帝國輝煌的殖民歷史，就不能體會格林威治時間所帶有的歷史性。同理，關於世界地圖的畫法，到底何以當前流行採用麥開脫圓筒投影法，不回溯歷史，也就不能掌握此一世界地圖構造的政治社會含意。假如研究者所熟悉的歷史時空，必須經過人為的定義，而得以參與定義的人又生在歷史時空之中，則定義時空計算標準的人，不就有一種超越歷史的永恆意識了嗎？²⁶

回到先前講的關於襪子的類比，關鍵在於到底社會科學研究中，研究者本身的位置重不重要？這是在 90 年代以降具有批判精神的社會科學家所提出來挑戰主流，也同時挑戰自己的疑問，即作為一個研究者，自己的存在形式與意義對於手邊的研究起了什麼作用？這就好像物理學家研究量子的人所提，他們在作為一個研究者在觀察物質的時候，研究者的存在對於觀察的對象的存在方式有影響。這個體認已經對過去既有的科學研究和知識觀產生很大的衝擊，也就是即令在物理學領域，一個研究者都不可能置身於所研究的問題之外，不對研究對象發生作用。像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在研究原子彈的過程當中，假如懷疑這個原子彈是要用來炸猶太人的話，他是否依然會盡心盡力，很快地將這個殺人的技術研究出來呢？換言之，當初原子彈要去炸猶太人或日耳曼人、日本人，對研究者的意義不同，使得做研究的人不可能無憂無慮。²⁷

²⁵ 楊國樞敘述自己以前「都是套用美國人的方法」，也提到台灣學界長期套用外國理論，只跟著外國走，因而沒有創造力和自信心，就連博士班學生也是相同的情況。參閱《我的學思歷程》第一集（台北：台灣大學出版，民 88），頁 4, 18。

²⁶ 所謂星辰沒有感情，原子沒有必須顧及的焦慮，故觀察是客觀的。關於科學如何以英雄式的模型，應用到歷史學、人類學、語言學等社會科學當中，參見薛綸（譯），《歷史的真相》，Joyce Appleby, Lynn Hunt, Margaret Jacob（著）（台北：正中書局，民 85），頁 15。

²⁷ 「披著無私心的中立外衣的核子科學，一直在位冷戰戰場的武士服務」，薛綸，頁 149。

也可以舉化妝品公司研究發展部門的科學家為例，當他們在研究一項化妝品對於皮膚所造成的影響時，也許看似科學的、中立的、客觀的，但是他們不會同時去研究，他們所從事的化妝品研究之所以發生，是因為社會上已經存在著一些關於男女角色的刻板印象，讓男女兩性渴望透過化妝品來表現出某種形象特質，可以彼此吸引。化妝品公司的科學家當然不會回溯，是誰讓他們去做這個研究，這個問題的來源，顯然在兩性關係上不是客觀中立的，而研究出來的產品對社會上的每一個人產生的效果當然不一樣？同理，原子彈丟下後，對日本人和中國人產生了不一樣的效果。這時能說這個研究是客觀中立的嗎？

研究者在介入或推動一個研究過程的時候，無所不在地受到了自己的生活關切、生命歷史與生長經驗所影響。但是數十年來所流行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要研究者忘記這一點，²⁸假裝研究者不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扮演任何的角色或起任何的作用，甘於一個裝配工的角色，只要把方法訓練完美即可。這種社會科學家，只要將國家與社會的概念，經由某種指標界定下來，然後觀察在這些指標上，國家有沒有透過行動來穿透社會，以此判斷所研究的政治社會體是個威權政體或民主政體。至於這一類的研究對當地人來說，即使本來是沒有意義的，都仍然可以稱之為科學。甚至，來自當地的學生在這一類輸入的研究議程中，學習這些來自歐美問題意識，²⁹從而改變了自己過去習以為常的思惟路徑，改以民主轉型或民主鞏固的角度，分析自己的政治社會。

這時的社會科學研究，反而成為本地人協助歐美人，在其實並不了解當地問題意識的前提下，經由研究活動來創造一種掌握了當地社會的感覺。社會科學如此的演進過程，無關乎客觀中立與否的問題，³⁰而是一種根據歐美發展經驗所產生的特定思惟角度，在科學研究的名義下，介紹到全世界，使得全世界都將自己當成是歐

²⁸ 在社會科學中，這種不容置疑的科學表明一種正統、教條的建立，不是通過科學成就，而是通過忽略背景並取締所有的競爭對手。錢俊（譯），《傅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Hubert Drefus and Paul Rabinow（著）（台北：桂冠出版社，民84），頁212。

²⁹ 楊國樞提到「回顧以前所做的研究題目...都是美國人做過的題目...。我們不管那個題目在我們的社會有沒有意義，我們還是照抄照搬...」，《我的學思歷程》，頁4。

³⁰ 科學「傳統」畢竟僅是人類生活中眾多傳統之一，是否較其他諸多傳統、意識型態更為重要或有用，卻沒有共通的標準或理性的規準可供判斷、仲裁。故對非科學知識傳統或意識型態，不能拿科學的標準去衡量或檢視，就像拿非科學標準去判斷科學研究一樣荒謬。參考周昌忠（譯），《反對方法》。

美社會一樣在研究，從而引導著全世界其他地區的發展，使逐步往歐美的經驗接近。準此，社會科學因此是一種相當濃厚的政治社會主張。³¹於是，爲了民族主義而犧牲民主，在以民主化爲課題的研究中，變成是與世界潮流違背的；或爲了經濟發展而犧牲民主，也變成是歷史潮流終將淘汰的一種現象。民主化的研究議程無形之中將當地人爲了抗拒歐美國家的干預，或抗拒資本主義體制的剝削，所表現出的外在行爲，當成是民主化條件不成熟的因素在看待。

伍·主流社會科學研究目的之檢討

面對主流的社會科學方法論，首先要自覺地思考，社會科學是一門對現實的認知還是有關特定政治社會的主張。³²這是學習做一個社會科學研究者的思考起點，點破當代社會科學家在研究過程中所表現的那種客觀中立，其實具有掩飾自己政治社會主張的作用，乃是將自己師承的歐美社會發展經驗，當成無所不在的普世定律基礎。³³定律（或法則）的概念，就真正地把研究者帶進了過去幾十年來社會科學研究的主流，社會科學家期許自己要透過研究來發覺行爲的定律，因爲自然科學家，尤其是物理學家，所研究的都是定律，後進的社會科學家要爭取科學界的尊重，當然應當致力於定律與法則的發掘。過去美國大學裡流行一個戲謔性的笑話，是政治科學家自我解嘲講的，謂物理學家都是一流的數學家，數學能力落後的物理學家，他有一條出路，就是去念經濟學，因爲經濟學家的數學在物理學家的眼中，只有幼稚園的水準，所以轉行到經濟學界保證吃得開。假如數學再不行，還可以轉行到政治學界來，因爲政治學家連碰到二元一次方程式都覺得高深無比。

³¹ 「一般自由派認爲『真正』的知識基本上是非政治性的，這種講法模糊了那原本就已高度組織化的生產知識之政治環境……一個領域的政治重要性，某些程度是來自於其中的內容是否有可能轉變成經濟術語，但是有更大的程度，則是來自於該領域與政治社會中可索求的權力來源之親密性……如葛蘭西所言，在市民社會的學術領域中，政治社會的影響已經伸入其中，並且達到飽和了」。王志弘等（合譯），《東方主義》，Edward Said（著）（台北：立緒文化，民），頁13-14。

³² 不少論者認爲，在社會科學之基本論點上，社會科學是被當作認知社會事務行爲的一種方法。例見李明燦，頁161。

³³ 從而必須剷除「使特徵或屬性的孤立成爲可能的社會技能、機構或權力安排」。錢俊，頁212。

既然最先進的物理學家講的是定律，社會科學家基於科學家的身份，當然也不能不努力於對定律的追求。社會科學家所追求的，是社會上人與人之間互動的定律。比如，社會科學界很流行的一種關於定律式的研究議程是，當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程度愈高，就會有人數愈多的中產階級，中產階級會對國家的徵收或汲取政策進行抵制，從而尋求參與國家的決策過程，³⁴則政治民主化的程度就隨之提升。一旦有了類似於定律的主張，研究者就可以去探測對不對，則科學家必須定義國家、經濟發展、中產階級、徵收、參與、民主等觀念。定義的方式通常根據歐美已經發生的經驗，因為這些觀念的發生，也是來自歐美學者對自身歷史的學習與建構。

當研究者先將自己的責任界定為追求普世性的行為法則，則歐洲所發生的經驗就理所當然可以是普世法則的靈感來源，如果在歐洲歷史的發展上，研究者認為自己看到有中產階級的出現，導致國家體制的政治民主化，於是以此為人類普世法則的探索基礎，顯然無可厚非，³⁵畢竟社會科學家還是要加以檢證，故即使這個關於法則的主張不正確，正確的法則遲早也會被發現才對。要是在其他社會探測之後，比如發現拉丁美洲出現過民主與威權的循環，並沒有線性地走向歐美所理解的自由民主體制，這時候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承認定律有問題，所以應該回頭審視歐美社會的發展經驗，重新理解，提出新的法則。另一種是指向作為研究對象的社會有問題。

由於歐美學者理解自己社會歷史的角度自幼習得，通常根深蒂固，並且在意識形態上早就對過去的種種發展做了正負面的評價，故情感上也受到制約，因此採納第一種反思的機緣不大。故當拉丁美洲出現民主——威權的循環，或當愛沙尼亞出現民族主義時，往往只會技術性地修正研究議程，把民主化不能順利發生的原因何在，當成是主要的研究任務。故民主轉型的研究進一步開展出了民主鞏固的研究，把拉丁美洲當成了一個生了病的對象在看待。民主鞏固概念的提出，等於更加確認了歐美社會科學家作為醫生的地位，社會科學法則作為一種政治社會的主張卻昭然若揭。

³⁴ 劉軍寧，頁 70。

³⁵ 這個知識信念也是政治人物向威權挑戰的合法性來源，故不是客觀中立的事實陳述，而是對事實有影響的主張，例如南韓金大中就曾就此辯稱，亞洲文化對民主一點也不陌生，只是一群威權領導者蓄意阻撓，李光耀即是其一。張定綺，頁 157。

陸、在地研究者的知識態度

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嚴峻課題是，如何要求研究者在發掘社會行為定律時，對於有關定律的假設如何產生，保持高度的警覺，不斷地反省某個定律假設，是從什麼樣的社會發展經驗中提煉出來的，從而使自己在檢證定律的過程中，對所研究的社會產生了什麼樣的效果，非常敏感地去處理：研究活動有多少教育宣傳的意義，是爲了誰，或站在哪一種社會位置與歷史位置上，宣傳對誰有利的主張？這些反省讓研究者回憶起馬克思主義中的「異化論」，³⁶內容是說工人每天都在生產線上裝配，但辛苦工作的結果，製造的都不是屬於工人的產品，所以當工人在生產線上工作時，他們疏離了自己的意識，存在本身變成了一個工具。³⁷故在生產線上的裝配工，原本或許是爲了養家餬口這樣的人性理由，而加入生產，但生產的過程卻剝奪了他們的人性，此之謂異化。³⁸假如社會科學家在研究過程中，淪爲歐美自我定義的普世法則的裝配工，只是在試圖將所研究的社會，改造成與歐美社會發展出定律所預測的一樣，那社會科學家無異是把自己異化了。

以台灣爲例，政治社會的參與者宣揚民主理論時，運用在課堂上所學習的概念，像是總統制、內閣制、制衡、選舉來檢證實際政治，或即使是學生在管理自己的學生會時，也常常引用這些概念來自我指導，或相互詰問。然而實際的行為動機，能不能用制衡或民主來理解呢？過去有一部電影可作爲類比思考這個問題，是很有名的「蒼蠅人」，電影內容是一位主角不小心與一隻蒼蠅一起進到一台機器裡，融合成一個複合體，剛出機器的時候，看起來還是一個人，但慢慢變成了一隻蒼蠅。³⁹

這就像是說一個本來所具備的型，在受到外力突然撞入之際，也許表面上這個新的複合體只會展現出來一種性質，但慢慢地隨著時間的過去，這一種性質會越來越薄弱，最後另外一種性質終於顯現。就像人們自幼受到家庭環境所培養的人格與價值，雖然隨著進入學校教育，與逐漸學到的新價值，開始會用這些新價值來觀察並批評大人的言行，表現年輕人的不滿，但之後在進到社會工作後，自己的作爲就

³⁶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斯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頁81，85。

³⁷ 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es)（合著），《1884 經濟學手稿》（台北：時報，民79）。

³⁸ 李志成（譯），《馬克思》，Terry Eagleton（著）（台北：麥田出版社，民89），頁74-80。

³⁹ 舊版變蠅人是1958年所拍，1986年又重拍，《影響雜誌絕版特刊》（中冊）（民85.1）。

一步步接近以前所感到不滿的成年人模式。這個過程很像蒼蠅人。

更進一步推演，如果原來是中國人的家庭，突然接受了西方教育，思想可能瞬間改變，不過在進入了新的價值體系後一段時間，慢慢地原來的特質又會再度重現。社會科學研究何嘗不是如此？研究者拿了一個歐美經驗所建構的定律，發現在地的政治文化相當有問題。不過當學者親身去參與政治後，恐怕其行為就與自己在做社會科學研究時行為大相逕庭。但兩個系統混淆在一起，讓研究者很難掌握。如果究逕行以歐美學者建構的行為法則為基礎，很難窺其全貌。

台灣過去在辯論總統選舉時應當採絕對多數或相對多數當選制，有一位立法院院長講了好幾條贊成相對多數的理由，不過結論卻主張絕對多數，當場與會者有所不解，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聯合報》就把這件事當成是一個笑話登在頭版。顯然他所陳述的理由是助理準備的，但他的主張與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無關，卻因為自己缺乏在公共場合可以受人尊重的理由，才必須覆頌一些學理上說得過去的話，他總不能公開告訴聽眾，自己是因為某某盟友的關係而選邊的。故真正支持絕對多數的理由，必然與所念出的完全不同，因此念錯了也沒有發現。

在這樣一個實踐中，在地的政治人物因為受到歐美社會科學有關術語的束縛，竟失去了表達自己情感傾向的能力，而必須要用一個自己完全不熟悉的語言，來掩飾情感傾向與社會需要，如此的行為當然產生許多的扭曲。⁴⁰有時候人們可能很相信自己公開講的話，因為每個人都受到西式教育，尤其是學而優則仕的人，提到制衡制度與自由價值時侃侃而談，但一旦離開了公共論壇，卻做了與先前言論完全相反的事情而不自覺。比如在與子女或老師互動時，因為當人們進入了完全不同的情境後，歐美的價值體系變成不相關。對社會科學的啟示是，研究者從哪一個角度發展研究議程，影響到研究所能發現的行為法則，所以誰在做社會科學研究是很重要的。

同理，經濟學原本是一種技術，至少在它注意的中心問題上是這樣。意思是經濟學觀察事實的觀點，是一種明顯而始終不變的實際評估觀點，即從全體居民「財富」的增長觀點觀察所謂現實；另一方面，這個觀察依據顯然不只是技術問題，因為它已併入到號稱自然規律的巨大思想體系，接納了十八世紀以降的合理世界。⁴¹經濟學風靡全世界的結果，與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氾濫是同步的，當然與帝國主義的歷史息息相關。社會科學知識作為一種關於政治社會的主張，對於研究對象的行為

⁴⁰ 參考石之瑜，《政治學的知識脈絡》（台北：五南，民 90）。

⁴¹ 黃振華，張與健，頁 98。

具有引導作用，不能用客觀中立的說法掩飾過去。

柒、社會科學與主體性的想像

回頭來看歷史，到底客觀中立的知識論像是從哪裡來的，顯然一個知識論的誕生不是自然而然的，也不是某些偉大的科學家天生就領略的。眾所周知在歐洲的歷史上有所謂的黑暗時代，黑暗是個壞詞，是後世的人穿鑿附會的顏色，指的正是羅馬教皇統治的時代。在所謂黑暗時代裡，沒有追求真理的需要，當然也就不容許客觀的概念，則黑暗所指涉的，部份乃是真理之不明。以致於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本思想，直追希臘城邦，而有了突破性的知識論誕生。⁴²雖然至今羅馬教廷仍然存在，但這已經是經歷宗教改革之後的體制了。

在當時被羅馬教廷和神聖羅馬帝國統治人民的眼中，絕對不是自稱黑暗時代，之所以是黑暗時代，是後世接受了文藝復興和宗教革命後的眼光，在回顧先前的歷史，才覺得它是那麼的可怕。主要關鍵之一，在於那段歷史中的人們沒有今世所珍視的主體意識，而是被教會所控制，而現代的人重新的找到了自我，因而感嘆過去的人生活在黑暗中。這個歷史回溯的態度，有點像當代台灣人在看五零年代的白色恐怖，感嘆當時特務體系對於持有異議政見人士的壓迫。大凡回顧的過程使得當代產生一種信仰，即自己所處的時代已經超越了有白色恐怖。不論白色恐怖或黑暗時代的說法，這都值得檢討，亦即對於當下不受壓迫或享受主體的感覺，在沒有過去歷史的對照之下，是否仍然深具意義？

關於文藝復興解放了歐洲人，讓他們跳出黑暗時代的這種慶幸，其實和我們後來科學研究的知識論之所以會發生，是息息相關的。不過，必須認識到，新的科學知識論的誕生，經歷了漫長的不確定的年代，並不是旦夕之間完成的。⁴³今日社會科學家對自己知識論體系的優越感，不但沒有歷史依據，甚至是對歷史的刻意遺忘。自文藝復興以迄科學革命，當前研究者之所以在心態上有信心敢於宣佈，自己作為研究者能在研究過程中和研究對象之間，維持某一個互不干擾的距離，是因為研究

⁴² 中世傳統文化的負荷，一為直觀物質與心智的世界。兩者皆藉古學復興而表現。王德昭，《劍橋近代史——文藝復興》（上冊），（上海：中華文化事業初版委員會，1955），頁145。

⁴³ 當時充其量處在一種 becoming 的不確定之中，不是今日宣稱地好像是自然生成的 being 狀態。參考 R.B.J. Walker, *Inside/Outs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者相信自己取得了一種脫離於世界的主體地位，這個主體地位在黑暗時代不存在，必須等到教會的統治被推翻，人可以與上帝直接溝通之後，人的存在才不受到世俗的決定，則任何人的主體地位都因為能與上帝溝通，而獲得確立。⁴⁴

這是所謂笛卡爾的焦慮來源，亦即擔心科學家所發現的定律，都是自己想像或建構的，不是來自上帝的鐵律。⁴⁵照道理，一項法則獲得確認之後，就必然能容許科學家進行預測，根據因果定律中相關的規定，發現屬於因的各種因素，據以判斷未來將發生的果。社會科學家當然也有相同的自我期許，希望擁有預測的能力，比如根據中產階級人數的多寡，來判斷政治民主化進程的速度。預測的準確與否，挑戰上帝的鐵律是否真為鐵律。不斷企圖預測的活動背後，恰是笛卡爾焦慮在作祟，蓋如果達不到預測的能力，就表示鐵律尚非鐵律，那是否根本不存在定律，則上帝也不存在？如此自文藝復興以降所推崇的人的主體性，因為恰是來自於上帝的賦予，便將就失去基礎，人自以為解放於黑暗世界，根本並未解放。這個含意的顛覆性無與倫比，將對整個當代關於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哲學造成毀滅性的撞擊。

這部份說明何以社會科學家對於定義是如此地強調，嚴格的定義可以帶來安定的研究對象。更重要的是，嚴格定義之後，研究對象成為可以操弄的被動者，不再是具有自己詮釋與流動能力的能動者。就好像醫生在為病人下藥方時，心中必有一種因果的設想，透過處方來控制病徵。一旦掌握了因果法則之後，則行為不但可以預期，也可以被操控。⁴⁶經濟學在這方面發展的體系是社會科學中最完備的，一旦掌握了經濟因素之間的因果後，政府透過對重貼現律，貨幣發行量，公共支出的掌握，可以引導投資與消費。

⁴⁴ 人文主義乃兼攝中世至近代的兩種心智運動：一為對於中世宗教精神的獨立運動，其表現為強調人的尊嚴與人於現世的生活；一為對於中世封建秩序的獨立運動，其表現為強調個性的尊嚴及其自我發展。這種從宗教精神、封建秩序中覺醒的獨立運動，正是我們所稱之「主體性」。王德昭，頁114-115。

⁴⁵ 宗教與科學之爭給人的印象是兩者背道而馳，但鮮有西方科學家不信上帝，上帝賦予主體性，但不直接提示客觀，故「客觀並不是要求採取上帝的視角，那是不可能的。」薛純，頁237。

⁴⁶ 故社會科學並未完全複製自然科學的方法，因為此一途徑它只是提供爭辯中特定知識性學科研究者所需的組織化知識以及各種需求而已。陳菁雯，葉銘元，許文柏（譯），《政治學方法論》，David Marsh and Gery Stoker（著）（台北：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民87）。

捌、詮釋的知識論

綜上所述，社會科學家發現定律的知識目的有三個，一個是用以解釋一個行為的發生原因，一個是用以預測未來的行為，再一個是提供藉以控制或改變行為的可能途徑。關於解釋，其意義與詮釋有所不同，而當前以美國社會科學界為主的知識論，並不重視詮釋，只特別重視解釋。蓋這詮釋學過去為教會僧侶壟斷，曾是科學家反對主要對象。⁴⁷

在進行解釋時，一般要求研究者放棄自己的主觀，在沒有主觀情感干預之下，對研究對象的行為提出因果關係的說明，謂之為解釋。故解釋的對錯與研究者是誰無關，而與證據是否充分有關。所謂的詮釋，必須透過研究者有意識地認知到，自己與研究對象之間在社會位置上有所差異，才能理解何以自己對研究對象行為的解釋，其實是一種有社會意義的詮釋，故詮釋反映了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相對關係。在以解釋為核心的知識論中，任何特定研究者的參與或退出，都不應該會影響其他研究者對行為進行解釋，但詮釋則是跟著特定人的經驗與關懷在發生，所以重視詮釋的知識論就把研究者的地位放得很重要，到底是誰在詮釋，影響詮釋的結果。⁴⁸因此，對詮釋知識論而言，不存在所謂主觀或客觀的分野。⁴⁹

像是台灣所發生的政治現象，若是在地的參與者在詮釋，其中可能有人就會特別關注於關說體系，動機在於判斷能夠讓自己鄉鎮從中獲益的形勢，有無發生變化。這一類參與型的研究者，對於體制中存在的各式各樣可能漏洞，特別敏感，藉以發掘機會進行人情或交易，迴避體制的規範，從而在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論述之外，開展出不同的研究議程。同理，象牙塔裡的研究者，也可以基於自己的認識，而想對政經體制中的關說現象進行研究，則也就認真處理參與其中的人的視角，使研究者能像參與者那樣看到，政經體制變遷對這些人的意義何在。⁵⁰

如果研究對象不是鄉鎮派系的領導人物，而是基層的村民，則意義就會發生轉變，因為對村民而言，並不能判斷哪一個人上台對家鄉的企業有所幫助，他們所在

⁴⁷ 薛純，頁 35。

⁴⁸ 薛純，頁 240。

⁴⁹ 陳瑞麟（譯）《傅柯》，J. G. Merquior（著）（台北：桂冠，民 87）。

⁵⁰ 社會科學方法不能捕捉社會現象的獨特性，因為社會科學的方法只能用一般化來系統化，閻子桂（譯）《社會科學的哲學》，Richard S. Rudner（著）（台北：幼獅譯叢，民 63），頁 83。

乎的可能是，如何安定地歸屬於一個派系族長的領導，假如說派系支持的人沒上台，那自己就很失落，所以族長支持誰，他們就幫忙支持誰，這樣對宗族派系裡的關係也比較好，至於具體到底誰上台並不重要，故投票行為不是關於政策立場或選民偏好，而是投票過程本身成為維繫宗族關係的工具。⁵¹

研究者必須認識自己在解釋與詮釋之間，是在做一個知識論的選擇，解釋的知識既不重視研究者的社會位置與情感傾向，也不重視研究對象的社會位置與情感傾向，而是要超越主客體的詮釋，提出一種因果關係。至於詮釋者卻尋求在與研究對象溝通的過程中，試圖了解自己作為研究者是如何存在，藉由與研究對象的溝通，進入研究對象的生活情境，學習體會研究對象的喜怒哀樂，這些感情能力的培養，無法在彼此頗為陌生的研究關係中用語言傳達，而要靠逐漸融入情境，因此需要較長的時間。

如同學習一種語言，詮釋者便是在學習研究對象的語言，站在研究對象的角度來說明他的行為意義，如此研究者不假定研究對象與自己是受到同一種普世行為法則的規範，反而從行為對象的意義體系中反省研究者自己的意義體系，⁵²使得研究者的主體地位，在與研究對象的辯證互動中獲得建立。這不像是以解釋為主的知識論中，研究者的主體地位是先驗的，超出研究活動的，在研究對象之上的。

原本詮釋的概念在近五十年的美式社會科學裡已經式微，一直到八零年代，一些批判性的反思進入了社會科學的領域後，研究者才重新認知到，詮釋和解釋屬於不同的知識論範疇。詮釋的知識論把研究者的位置凸顯出來，故當一位研究者研究民主時，第一個反思就是民主的概念自何而來，誰教導研究者以民主化做切入點？有了這一層反思，研究者才會敏感地避免武斷地替民主下定義，因為研究者知道民主對自己的意義，是有特定生活關切、生命歷史與生長經驗的基礎。⁵³假如研究者一心想發現，自己對民主所體會的意義，是不是能被研究對象所接受，反而凸顯了作為一個研究主體的武斷性。詮釋的知識論預設了研究者對自己社會位置的體認，

⁵¹ Chih-yu Shih, "Public Citizens, Private Voters: The Meaning of Elections for Chinese Peasants," in J. A. Robinson (comp.) *Villager Committee Elections in China: A Selected Collection of Essays* (Atlanta: The Carter Center, 1999).

⁵² 「只有通過理解背景文化實踐對所涉及的文行者意味著什麼，社會科學才有可能，如果不是預測的話，起碼也能事後倒過來，理解這一現象的意義。」錢俊，頁 212-213。

⁵³ 範例可參見，Merle Goldman and Elizabeth Perry (eds.), *Changing Meanings of Citizenship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所以研究者才能懂得尊重研究對象的社會位置。在解釋的知識論中，研究者追求的是關於研究對象行為因果的真理，也就是上帝的道理；在詮釋的知識論理，研究者最終在探討自己的生命關懷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

在研究民主化時，根據在地的歷史文化脈絡，詮釋者試圖提出不同的研究課題，而解釋者則力求超越歷史文化脈絡，設計所有人都能回應的研究題目。如果研究中國的民主化，詮釋者首先問這個民主化的概念是從哪裡來的，在中國歷史演進中，民主的意義如何開展變遷，比如對於孟子、黃宗羲、孫中山而言，意義有何異同，對於現代國人而言的意義又是什麼。同時也要反省，對於西方研究中國民主化的人又有什麼意義？民主在這幾種人身上若有不同意義，那他們在溝通的過程中所發生的現象又是什麼？中國民主運動人士所要推動的民主化，目的是什麼，對話的對象是誰，意義何在？這樣的知識論體系下，個別研究者和研究對象之間就建立了倫理關係，兩者之間的對話是有關連的，因為對話會影響到彼此。所以可以看到，一旦社會科學進入詮釋的領域，社會科學研究的目的就會發生轉變。社會科學家可以免於浸淫在江澤民所穿的襪子有何特質中，在承認自己和江澤民之間的倫理關係後，研究者培養了超越自己對球襪的著迷，而能藉由江澤民的行為來反思自己對球襪的著迷從何而來。

玖．研究者自己的位置

有一個很有名的政治學家曾批評區域研究的學者，認為他們對歷史與文化脈絡過於重視，所犯的錯誤，猶如是認為鳥比人更了解鳥為什麼會飛。他無異就是嘲笑詮釋學家，居然相信從研究對象的思惟脈絡裡，可以得出有意義的解釋，則不如去問鳥自己，為什麼牠會飛。作為科學家，他相信研究中國的人不需要去在乎作為研究對象的中國人為什麼會如此想，因為他們的行為自有因果法則，不受行為者思惟所影響。⁵⁴過去心理學家曾做了一個實驗，把一隻小象綁在樹上，小象當然沒辦法掙脫，等到小象長大，再把牠用鐵鍊綁到樹上，牠根本不會試圖去掙脫，可見大象的生長經歷制約了牠的認知，也影響行為。而人的意義認知與創造比大象或鳥都複雜，如果研究者了解江澤民怎詮釋自己行為的方式，當然有助於研究者學習江澤民

⁵⁴ 故詮釋知識論懷疑社會科學家試圖解釋或預測人的現象，見劉北成，楊遠嬰（合譯），《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Michael Foucault（著）（北京：三聯，1999）。

的自己的思惟。只有透過研究對象本身，才能掌握行為的意義，也才有可能了解同一種行為在不同時空下的意義會發生轉變。所以研究者不單純只是看外在表面的行為，以解釋外在行為的因果為滿足。

社會科學的研究的目的，有人說是建立法則或定律，有人說是解釋，有人說是要去預測並且控制。⁵⁵一旦了解研究者不是獨立於研究活動之外，而是在與研究對象互動中了解自己的生活的話，那應該接受，詮釋的境界是社會科學更進一步的境界。不但要解釋特定情境中的行為因果，而且還要回溯情境的意義在歷史上如何發展至今，並詮釋行為的意義如何因人與因情境而異，從而開拓更多不同的詮釋角度。

初稿收件：2002 年 08 月 27 日

二稿收件：2002 年 9 月 16 日

審查通過：2002 年 10 月 16 日

責任編輯：陳文祥

作者簡介：

石之瑜：

美國丹佛大學國際研究博士

臺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通訊處：臺灣臺北市 100 中正區徐州路 21 號，臺灣大學政治系

Email：Cyshih@ccms.ntu.edu.tw

⁵⁵ 陳菁雯，葉銘元，許文柏，頁 102。



Why Do Social Scientists Do Research? ——A Critical Note

Shih, Chih yu

Abstract: The goal of social scientific research is more than explaining or predicting. Explaining is premised upon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researcher from the subject of study. However, no researchers are independent of the subject of his study. This paper uses a number of analogies and examples to illustrate how researchers' own life history must be a part of the social scientific research.

Key Terms: Epistemology • Methodology • Explaining • Interpreting • Subjectivity • Social Science